

詞  
學

第一輯



《词学》编辑委员会

张伯驹 夏承焘 俞平伯 任中敏  
唐圭璋 潘景郑 黄君坦 钱仲联  
宛敏灏 吕贞白 王 起 徐震堦  
程千帆 万云骏 施蛰存 马兴荣  
主 编  
夏承焘 唐圭璋 施蛰存 马兴荣

317

词学

第一辑

《词学》编辑委员会编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1/32 10 1/16 印张 240 千字  
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统一书号：10135·002 定价：0.90 元

## 《词学》创刊缘起

在迎接「四化」，开展科学的研究的高潮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学的研究，也相应地出现了提高和深入的前景。我国的古典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广大的领域，优越的传统，繁富的作家作品。每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固然不可能博涉多方，全面淹贯，而全面的研究，则有待于个人的专业分工。我们创刊《词学》，就是企图在浩汗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分取一个专业作为我们耕耘的园地。尽管我们对词学的研究，还只是浅尝，但有了这个园地，可以集中国内外学者的词学研究成果，互相商榷，互相切磋，互通信息，互为补益，大家都可以借此获得研究的方便。为此我们不自量力，试办这个专攻词学的集刊。我们希望得到国内外同道学人的支援，使这个刊物能为词学研究者提供专业论坛，为词学爱好者提供专业读物，为从事古典文学教学或文化工作者提供进修及参考资料。

一九八一年一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

## 词学 第一辑篇目

### 论 述

历代词学研究述略

唐圭璋 金启华 (二)

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

马兴荣 (三)

换头举例

夏承焘 (二七)

清真词的艺术特征

夏承焘 (二七)

张元干及其《芦川词》

万云骏 (吾)

从碧词话

曹济平 (吾)

天风阁学词日记

张伯驹 (董)

刘辰翁事迹考

夏承焘 (董)

读韦庄词札记

马群 (三〇)

炫人眼目的境界

施蛰存 (一八九)

徐永端 (一七九)

- 金元明清词选序 ..... 周笃文 (二〇)  
试论王国维的词 ..... 祖保泉 (一五)  
《人间词话》述评 ..... 陈兼与 (一〇三)

文 献

- 声 执 ..... 陈匪石 (一五)  
草堂余意 ..... 陈匪石 (一五)  
草堂余意 ..... (明) 陈 铎 (一一三)

转 载

- 关于「越调诗」的二三问题 ..... (日本) 松浦友久 (一〇三)

书 志

- 陈大声及其《草堂余意》 ..... 施蛰存 (三一)  
历代词选集叙录 ..... 舍之 (三七)  
新出词籍介绍 ..... 是水 · 丙琳 · 北山 (三〇三)

丛 谈

- 清真词语 ..... 采泉 (三四) 花面丫头 ..... 舍之 (三〇)  
蒋鹿潭词 ..... 癫云 (三六八) 马知人意 ..... 舍之 (三九)

钱枚《微波词》…………痴云(四九) 龚定庵佚词…………北山(五一)

词苑(二八九)

徐昌峰五首 黄君坦五首 夏承焘四首 俞平伯二首

陈兼与三首 钱仲联二首 吴鹭山四首 陈迩冬三首

李宝森六首 周退密四首 周汝昌一首 周笃文一首

编辑后记

编者(三一〇)

图版

一 周邦彦书《屏迹帖》

二

双照楼影宋刻《片玉集》

三 况周仪画红梅

四

郑文焯画松扇面

# 历代词学研究述略

唐圭璋 金启华

在中国诗歌领域里，词是一种特殊的诗歌样式，它和律诗、绝句同为格律诗，不过律诗、绝句是整齐的五七言格律诗，词则是长短句的格律诗。虽然词也有与五七言律诗句数相同的词调，如生查子、玉楼春，但在句子平仄、用韵方面仍然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律诗、绝句是整齐句的格律诗，词是长短句的格律诗，这是中国格律诗的两大类。律诗、绝句兴起于唐代，诗人辈出，词则繁荣于宋代，亦有万紫千红之盛。

词兴于唐，盛于宋，历元明清三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词家数千人，词作无万数。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是一个重要部门，因此，它逐渐成为文学研究者的一门专业，对词史、词乐、词律、词韵以至版本校勘、笺注等等，历代均有学者进行研究，各有贡献。本文企图对历代词学研究情况作一次简要的介绍，为当前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份研究线索。

## (一) 词的起源

词的起源，为研究词史的第一个问题，历来为词学研究者所重视，而诸家观点并不一致。现在，

我们认为词的起源是和音乐有密切的关联，我们不能离开音乐而谈词的起源。如果就诗歌的长短句形式来说，那么，在《诗经》和乐府诗里实早已有之。如果就音乐而言，则秦以前用的是雅乐，汉魏六朝乐府用清乐，隋唐的新乐则用燕（同宴）乐。由于隋统一了南北朝，将胡部乐和中原乐综合起来，成为当时的新乐——燕乐，词即由此产生。所以宋人王灼在他的《碧鸡漫志》中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这就是说明了词的起源和音乐的密切关系。唐沿隋制，在音乐和文学方面日益发展，词就随之而兴起，这是很自然的事。

词又是起源于民间的，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旧唐书·音乐志》称：「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胡夷是指外来乐曲，里巷即指民间流行的乐曲。歌者综合运用这些乐曲，成为新声，足以说明词与音乐的关系，也说明词有来源于民间的成分。近人或谓词创始于封建帝王，或谓词起于封建文人，皆背本逐末之论。隋唐以来一些词的曲调，大都见于唐肃宗时人崔令钦的《教坊记》，其中所录曲名有三百二十多个，都是当时的流行新曲。例如望江南、菩萨蛮等。在敦煌石室中所发现的曲子词，更有以这些曲名标题的词作，由此可证望江南不起于中唐，菩萨蛮更不起于晚唐。说词起于晚唐，本是明人妄说，证之唐人所记载的资料，其说可不攻自破，而近人误信明人之说，不以事实为根据，说词起于中晚唐，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 (二) 词乐

词起于隋唐的燕乐，词乐为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词乐的研究，对象是词的音律，涉及的

问题如宫调、旁谱等。可惜的是古乐的节拍已亡，即使有谱，也不能歌唱了。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困难。但是历来研究词乐者仍然大有人在，他们希望词终于能获得演奏。大致说来，词乐依照音律的次序，宫调有八十四调，即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乘以十二律。宫乘十二律为宫，其余七十二调皆为调。总名为宫调。宋代的宫调谱字载于张炎的《词源》，又见于姜夔为他的自度曲注明的旁谱，我们尚可据以探索词乐情况。现在把历代研究燕乐及词乐的情况，作一概述。

一、隋唐时期 《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及杜佑《通典》皆有论述燕乐情况的记载。崔令钦的《教坊记》记载燕乐曲名三百二十四调，大曲四十。南卓的《羯鼓录》专述鼓曲。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则广泛记载唐代雅乐、清乐，兼及歌舞、俳优、乐器。

二、两宋时期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论及雅乐、清乐、燕乐兼及词腔和声。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曾探讨词调源流。赵德麟在《侯鲭录》中，则记载了他自撰的蝶恋花鼓子词十二首，当时的诸宫调就是由此递变而成的。曾慥在《乐府雅词》中，则录有大曲、转踏。陈旸的《乐书》，则详考了音乐演变。朱熹也谈到过关于腔调泛声的意见。宋代修内司所刊的《乐府混成集》一百余册，皆有谱无词。此书在明代尚存，现在已不可见了。此外，张枢有《寄闲集》，杨缵有《圈法美成词》，皆旁缀音谱，可惜今皆不传。《词源》附有杨缵的《作词五要》，即：一要择腔；二要择律，三要调词按谱；四要推律押韵，五要立新意。所谈虽意在作词，但重点却在词乐方面。从以上所举文献，可见宋人对于词乐，已有非常专门的著述。

三、元明时期 元明人研究词乐，元人侧重在词乐之伴奏乐器，如陈元靓之《事林广记》，对管乐种类有过记载，有官笛、羌笛、夏笛、小孤笛、鹧鸪、扈圣、七星、横箫、竖箫等九种。这些乐器今多

失传，不可知其具体形状，但知其管色之繁多，实数倍于今之管乐器。书中也有论及宫调腔韵的，则与《词源》大同小异，也可与姜白石的旁谱互相刊正。明初朱权有《唐乐笛字谱》，是专谈唐宋笛曲的。其后朱载堉作《乐律全书》，韩邦奇作《苑洛志乐》，又都是论音律及俗谱的，也可供研究《词源》之参考。

**四、清代** 清人研究词乐，重点是放在《词源》及白石旁谱上，皆尽毕生心力为之，成绩显著。先后成书而著名者，有凌廷堪的《燕乐考原》，方成培的《词麈》，戴长庚的《律话》，陈澧的《声律通考》，徐灏的《乐律考》，张文虎的《舒艺室余笔》，郑文焯的《词源斠律》，皆各有见地，能互相补充，为研究词乐者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文献。

**五、现代** 近人对词乐有研究兴趣的很多，方面也广，对于词乐有关的问题也扩大探讨，以期互相发明。对《词源》音律及白石旁谱深入研究者，有任二北、唐兰、夏承焘、丘琼荪、杨荫浏、阴法鲁诸家。研究大曲的，有王国维的《唐宋大曲考》。研究隋唐燕乐的，有日本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查》（郭沫若译）。研究宫调的，有夏敬观的《词调溯源》。讨论古乐与今乐关系的，有童斐的《中乐寻源》。专门研究《词源》的，有蔡桢的《词源疏证》。叙述宋代歌舞剧曲的，有刘永济的《宋代歌舞剧曲录要》。以上所举各家的论著，对我们研究词乐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敦煌石室所出的唐代舞谱，与词乐也极有关系。叶玉华有《唐人打令考》附敦煌舞谱残卷，并有释辞。冒广生也有《敦煌舞谱释词》。吴庠又有《唐人打令考补义》。这些研究成果，也都是我们研究词乐的重要资料。一九五八年，香港大学出版了一本《词乐丛刊》，发表了饶宗颐的《白石旁谱新铨》，是根据日本传钞本明人魏皓所作《乐谱》，以考证姜白石的旁谱。《词乐丛刊》中尚有赵尊岳的《讴歌要旨八首解笺》，对张炎

《词源》中的《讴歌要旨》作了新的考释。此外还有姚志伊的《论折字》、《论姜谱之翻译与板眼》，都是近年来极可注意的研究成果。

### (三) 词律

由于词乐失传，词的音律、音谱也都随之而亡失。虽经后人研究，但唐宋人具体唱奏情况如何，仍难得其真相。清初人万树所编的《词律》，虽名为词律，实际并非词的音律。王奕清等所编的《钦定词谱》也非词的音谱，他们考究的都只是词的文字格式。不过词的文字格式，原为配合音乐而形成的，所以直到今天，文字格式也可能作为吟诵及习作的依据。

词的文字格式，大致可分为：分段、词调、词体、句法、用韵及平仄四声等项，今分别略述如下；

**分段** 单调的词不分段。双调一般分上下两段，还有分三段和四段的。三段的词，前两段短，后一段较长，名为「双拽头」，例如瑞龙吟，词的下段开始处，通称为换头，或称过片。最长的词分为四段，例如莺啼序，长达二百四十字。

**词调** 词的调名都与音乐有关系，如令、引、近、慢、摘遍、犯调、三台、序子、叠韵等。不过明人顾从敬改编《草堂诗餘》，开始把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那就是从字数多少来区别了。清人毛先舒谓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字以上为长调。这样分法，其实并不恰当，不过已经习以为常，也不妨以此来表示词的形式的长短不同而已。

**词体** 由于词的音乐性有变化，如添声、偷声、减字、促拍、摊破等，词体也有了繁衍。研究词

律、词调者，势必研究到词体。这一部门，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词的句法，韵法，都有关于词体，而为研究词律者所注意的。

研究词体、词调的著作，最早的是明人张綖的《诗餘图谱》三卷，同时有程明善作《啸餘譜》十卷，其中有《诗餘譜》三卷。这两部书虽有草创之功，但谬误甚多。

清代康熙年间，宜兴人万树，字红友，编成了一部《词律》，收词调六百六十，词体一千八百馀。在张綖的基础上，用精密的科学方法，归纳出唐宋以来各个词调的体式，但是还不能没有错误。咸丰年间，杜文澜作《词律校勘记》，同治年间，徐本立作《词律拾遗》，都是为万树补遗正误的。康熙晚年，命儒臣编成了一部《钦定词谱》，共四十卷，收词调八百二十六，词体二千三百零六。这是在万氏《词律》的基础上增补校改而成，以帝王的力量来编此书，当然是集大成的著作，但也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疵。

晚清有舒梦兰作《白香词谱》，选取最常用的词调一百阙，注明平仄，可以说是《词律》的简编，为作词者的日常用书，几乎人人必备，听说最近已有重印。近人林大椿作《词式》，龙沐勋作《唐宋词格律》，也是这一类为学习作词者提供方便的书。

#### (四) 词韵

最初，词家作词，都用诗韵，有时也以自己的方言押韵，并无词韵专书，因此，词韵较诗韵为宽，填词用韵较作诗为自由。由此也可以看出，一种新兴文体产生时，在格律方面，有其自由天地，限制

性较少。

南宋时，朱敦儒曾拟定词韵十六条，入声韵四部，这当是最早的词韵著作。后来有张辑为它作注，冯取洽为之增补，似乎已成词韵的专书，可惜此书早已失传。

明代的词韵专书，有胡文焕的《会文堂词韵》，编订不善，不为人所采用，故流传不广。清代词韵专书较多。主要的有沈谦的《词韵略》，吴烺等编的《学宋斋词韵》，而以戈载的《词林正韵》最为精审。晚清以来，词家填词选韵，大都采用戈氏的分韵法。《词林正韵》系用《广韵》韵目，而合并平、上、去三声为一部，共十四部，加以入声五部，全书共为十九个韵部。吴瞿安在其《词学通论》中，论词韵之平、上、去三声，仍依《词林正韵》，但把入声五部增为八部。

此外，词人有用各地方音叶韵的，戈氏此书并未涉及。这里，我们略举数例，以说明方言在词韵中通叶，更可证明词韵之宽。

一、居鱼与齐微通叶 例如苏轼的渔家傲，以「似」与「度」叶。史浩的菩萨蛮，以「去」与「事」叶。石孝友的千秋岁，以「鲤」与「醸」叶。

二、萧豪与幽侯通叶 例如曾觌的钗头凤，以「照」与「透」叶。刘过的辘轳金井，以「溜」与「倒」叶。陈允平的水龙吟，以「草」与「骤」叶。这是福建方言的音韵。

三、歌戈与萧豪通叶 例如黄裳的蝶恋花，以「过」与「早」叶。郑域的念奴娇，以「果」与「岛」叶。林外的洞仙歌，以「锁」与「考」叶。这也是和福建方言有关系的。

四、庚亭与江阳通叶 例如吴文英的法曲献仙音，以「冷」与「向」叶。

五、真文与东冬通叶 例如《云谣集》中的天仙子，以「问」与「洞」叶。

以上所引，可以看出《词林正韵》未注意到方音在词韵中的广泛使用，确实为其不足之处。罗常培曾作《唐宋金元词韵谱》以补正戈氏的疏漏，可惜未及刊出，遗稿已尽散失。

## (五) 词人传记

研究一位词人的作品，当然首先要了解他的生平，但由于过去史家对词人不加重视，为词人立传的很少，即使有传，也极简略。有的更未经详考，以致错误较多。在过去的词选集中，一般也附有小传，但只寥寥数语，意义不大。

对于词人的时代、籍贯、世系、生活，如不详加考订，往往导致错误。兹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将词人的时代记载错误的，如陈凤仪系北宋时人，见宋人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十。这并非僻书，但清初朱彝尊编《词综》，却把他列入元人。其后，《词林纪事》也跟着错误。甚至清代同治年间杜文澜作《词人姓氏录》，也还把他列为元人。

二、将词人的籍贯记载错误的。如《词综》记柳永为乐安人，《山左人词》也沿此误。实则柳永是福建崇安人，福建省地方志书载之较详，从其家世上考察，也可明确无疑。《词综》误为乐安，就硬派柳永为山东人了。

三、对词人世系未加细考而致错误的。如张炎为张俊之六世孙，有人误以为五世孙。又有人把张炎误为张镃之孙，这都是弄错了世系。实则张炎为张镃之曾孙。张镃以下是按五行排列辈份的，张炎为火行，炎之父桓为木行，桓之父濡为水行。胡适不知张家以五行排辈份，称张炎之祖父为

含，实则张濡字子含，不是名含，他又把名与字混淆了。

四、把词人的生卒年记错了，对他们的词作就无法解释清楚。如张元干的生年，据其自撰《芦川归来集》，系生于宋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可是现在的选本，却把张元干的生年误为宋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相差二十馀年。这样就把张元干在靖康之难以后，南宋时期他写的送李纲、送胡铨的词都弄错了时代。又如南宋岳珂在五十八岁时还作诗，有些书说他卒年五十二，显然是错误的。又如尤袤卒于宋光宗绍熙五年（一一九四），然则姜夔就不可能于宋宁宗庆元二年（一一九六）在无锡和他会见了。

综上所述，可见研究词人传记，很有必要。因此，近代词学研究者对词人的生平，参考各种史籍，写定传记，大约可分为以下四种体例。

一、小传，如刘承干有《历代词人考略》，此系稿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其中所录词人，较《历代诗餘》所附的《词人姓氏录》为详，颇有参考价值。

二、年表 王国维在其所作《清真先生遗事》后附有《周邦彦年表》，系大事记性质。对周邦彦的生平，考证甚为详尽，而且辨别伪讹，也至精确，为考证词人生平的研究方向开了先路。

三、年谱 邓广铭有《辛稼轩年谱》及《陈龙川年谱》，早已流传，对研究辛、陈的词，均有帮助。夏承焘有《唐宋词人年谱》，计有韦端己、冯正中、南唐二主、张子野等九家的年谱以及温飞卿等三家的系年，搜罗既广，考证亦精，实为词学研究者必读之要籍。此外，王仲闻有《李清照事迹编年》，对李清照的生平，也搜集了丰富的史料。

四、词史 在词人传记辑录丰富，考证精确之后，则词史之研究才易于进行。过去刘毓盘、

王易都曾撰作《词史》，只是略述纲要，标明线索，对于唐五代两宋诸大家之成就，则少评论。至于敦煌曲子词，他们尚未能见到，自然不可能论及。惟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而继承前人这一事业，则是后来者的责任了。

## (六) 词集版本

宋词盛极一时，当时词集的刻本已很多，历金元明清以至近代，版刻愈多，不可胜数。就宋刻本而言，北宋本现在已极少见，南宋本则见于著录者，还有不少。天一阁藏书中，颇多秘籍。汲古阁刻本词集初刻不精，惟后来所辑宋词百家，元词二十家，钞校皆精，后来大多分散，为藏书家所得。清代著名藏书家，如士礼居、铁琴铜剑楼、海源阁、皕宋楼、八千卷楼皆以收藏宋元善本词集著名，可惜也多散佚。

由于版刻不同，遂致词集的名称也不同，其卷数、词数、行款、字体的优劣亦皆不同。有因地而异的；有因时而异的；有因人而异的，今分别略述之：

一、因地而异的。如长沙刻本有《百家词》，见《直斋书录解题》。杭州刻本较为精美，有赵以夫的《虚斋乐府》，许斐的《梅屋诗餘》，戴复古的《石屏长短句》，又有《典雅词》，今可知者十九种。福建刻本则有欧阳修的《醉翁琴趣》，晁元礼的《闲斋琴趣》，秦观的《淮海琴趣》，叶梦得的《石林琴趣》，赵彥端的《介庵琴趣》，黄庭坚的《山谷琴趣》等，均其较著名者。他如吉州、南京、武昌、成都等地，也都有词集刻本，以各地经济情况、刻工技术之不同而有所差异。

二、因时而异的。如辛稼轩词在宋代为四卷本。元代则有十二卷本。明代吴讷有钞本《稼轩词》四卷，但多误字。近人林大椿有校吴讷本词。赵万里发现的汲古阁精钞宋本《稼轩词》四卷，则是最为可贵的。又如张孝祥的《于湖词》，在宋代只为一卷，明代汲古阁刻本只有词二十八首。后来又发现了宋刻《于湖居士全集》本附词四卷，又宋单行本《于湖词》六卷，六卷本并注明宫调。又如日本影印元至正癸未刻本《草堂诗馀》，并无编者姓名，但北京图书馆所藏元至正辛卯刻本则题云：「宋何士信编」。可见前本有脱落，后本则为完整。又如宋代赵闻礼所编的《阳春白雪》久已不传，直到清道光间始被发现，故明清以来各家词选皆未能选及。郑振铎曾发现一个用篆文写刻的《阳春白雪》残本，是明嘉靖刻本，更是词籍中的奇书。

晚清词学大昌，王鹏运之精刻，朱祖谋之精校，吴昌绶及陶湘之影印，皆为词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后《四部丛刊》影印之《乐府雅词》、《花庵词选》以及其他善本词集，皆有功于词苑。赵万里曾计划影印十种善本词集，只印出了明万历吕远刊本谭尔进编写的《南唐二主词》，其余九种均未印出，不知流落何处，似应访查，把它们印出来，以实现赵氏遗志。

三、因人而异的。如元人印的《草堂诗馀》是以四时景物、天文地理、人物人事、器用花鸟分类。明嘉靖刻本《类编草堂诗馀》，题武陵逸史编次，则改为以小令、中调、长调分别编次，与分事类本不同。嘉靖以后所刻《草堂诗馀》，如《词苑英华》本及沈际飞、钱允治、卓人月、潘游龙等所编词书，皆分小令、中调、长调编次。明陈耀文的《花草粹编》也是以小令、中调、长调分编的。此书原为十二卷，清咸丰间金绳武重刻本分为二十四卷，但校订疏舛，反而失去陈本原来面目。可见由于编印者学识水平不同，刻本遂因人而异。